

红色印记

# 中央苏区红色报刊何以热销?

□陈蓉

1952年,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回忆:苏维埃运动时期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办有大小报刊34种,其中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青年团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红军机关报《红星》等在群众中影响巨大,深受百姓喜欢。

而据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介绍,“《斗争》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能销27100份,《红色中华》45000份以上,《青年实话》28000份,《红星》17300份”。

当时中央苏区范围不大且以农村为主,为何红色报刊却能如此热销?

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地处经济落后的偏远山区,当地的农民群众很难有学习受教育的机会。中央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后,毛泽东便专门指派他的老师徐特立负责中央苏区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要求各校进行教员登记,开设教员训练班,培训师资。1931年10月,中共杭武县第一区委召开党员大会,要求各乡劳动学校、夜学、俱乐部、阅报社、识字牌要迅速建立起来。

1933年,福建省苏维埃政府通过决议案,指出“俱乐部、工农剧社、读报班、识字班、列宁小学校、工农补习夜校、宣传鼓动队等宣传教育机关的组织,已建立的要立刻健全扩大起来,未建立的要迅速普遍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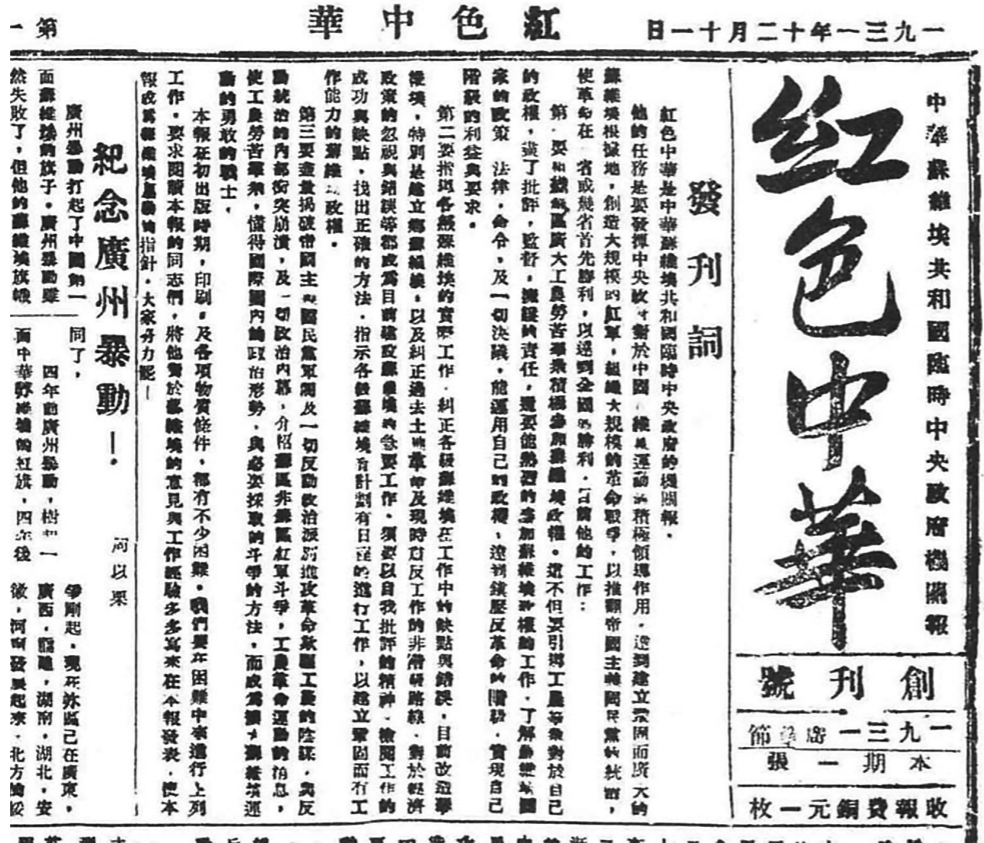
虽然当时中央苏区物资极度匮乏,且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围剿”斗争,但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组织专人编写识字课本,动员群众把祠堂改造成教室,把神龛、门板拆下来当课桌……在人民群众中掀起了一股识字热潮。红色报刊的出现是苏区开展识字运动的产物,而其热销又是识字运动高涨的结果。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全面宣传我党的正确主张,同时也满足苏区人民对文化知识的渴求,红色报刊作为宣传鼓动、普及文化的利器在苏区得到广泛使用。

1929年8月7日,中共福建省委对闽西的宣传作出强调:“在闽西斗争区域应设法创办一小日报,登载群众斗争的情绪,拥护苏维埃的热烈表现,尽量地分送到闽西斗争区域内及设法用邮政寄送到全省各地去……可先用石印出版,每日出一小张也好,只要经常出版。此外,各县各区也要尽量办壁报、新闻报,近期出版,分送各地。画报是一件很好的宣传工具,尤其是适合于向内地一般不识字的农民妇女宣传。”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闽西上杭县主持召开“古田会议”,会上专门讨论了为根据地兴办革命报刊、红军游击队报刊等内容。此后,红军应规定出版《时事简报》,内容主要是报道国内政治消息、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和红军工作情形,一般每周一张,手抄壁报形式,也有的是油印小报。

随后,各个革命根据地的机关报刊便如雨后天春笋般出现了,如闽西苏区的《火山》《锋芒》



《红色中华》报创刊号

《浪花》、中共福建省委的《布尔什维克生活》《政治通讯》《烈火》《红旗》《斧头与镰刀》、鄂豫皖苏区的《工农报》、湘赣苏区的《湘赣红旗》、湘鄂赣苏区的《工农会》、红三军团的《红军日报》、红一军团的《战士报》。据统计,仅湘鄂西苏区便有红色报刊20多种,闽西苏区还建立“书报社”“读报社”等。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作出了《关于党报的决议》,明确以后党报必须成为党的工作及群众工作的领导者,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影响的有力的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

报刊为苏区人民所喜欢,更取决于报刊的形式和内容。由于当时苏区受到敌人封锁而信息闭塞,加上群众文化水平有限,报刊一般都开辟通俗易懂、简洁明了的专栏,向老百姓传播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党的政策方针路线、马克思主义等。比如总发行所和印刷所设在闽西长汀县的《青年实话》,主要撰稿人都是当时党内的理论名家如顾作霖、陆定一、张闻天、张爱萍、曾镜冰等,他们能运用灵活短小的版面、言简意赅的内容、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苏区人民进行宣传和报道。张爱萍的《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加紧少先队的教育工作》仅250多个字,萧华的《加紧政治动员消灭小差的现象》仅120余字,便把事情和问题写得透彻明白。

通过画报进行宣传报道是当时苏区报刊的主要形式。比如,收藏在建宁县革命纪念馆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少共国际师画报》便是《青年实话》副刊的画报。画报以12幅画面并配

有文字说明和一首歌曲的连环画形式,介绍了苏区少年踊跃参加少共国际师的生动场面,父母、妻子动员亲人参加少共国际师的动人情景,少共国际师的战士开展练兵和文娱活动等,以生动、活泼的画面讲述极具思想教育性的事件,反映了少共国际师成立的意义。

报刊亦十分重视宣传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苏区政策,并通过“读者来信”等专栏听取意见。比如1932年《红色中华》第20期就刊登了一则“法令解释”,其内容是临时中央政府内务处专门答复上杭县才溪区苏维埃政府的一封关于红军信件免费寄递政策咨询的来信。各个报刊更多的是关于苏区的土地政策、农田灌溉、鼓励参军、学校教育等老百姓日常所关注话题的报道。比如谢翰文刊登在《红色中华》的《我对分田中几点意见》一文就是他在广泛调查基础上形成的一篇报告,再如《瑞金白露乡跋水问题》等报道则是关注到老百姓田间耕种等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这样一来,苏区报刊因为时刻把人民的需求装在心中,就越来越受到百姓的欢迎。

面对敌人的信息封锁,报刊也注重报道国际国内革命局势。《红色中华》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便发表了《东三省已成日本殖民地:积极移民排除华人,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等文章对东北的局势进行报道。更多的报刊集中宣传了各革命根据地红军在对敌斗争中取得的胜利,鼓舞了苏区人民参加革命的士气。苏区报刊成为当地民众了解外部的重要窗口。

中央苏区报刊的热销,还得益于在当地形成了一条印刷、发行、投递完整的链条。1927年早在南昌起义部队陆续抵达长汀时,长汀毛钟铭创办的毛钟铭印刷所就开始为革命军队印刷大量的宣传材料。1930年,古田会议决议《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最早也是由该印刷所印刷出版。

1931年春,在闽西苏维埃政府的帮助下,以毛钟铭印刷所为基础创办了中央苏区最早的一家红色出版发行机构闽西列宁书局,是中央苏区持续经营时间最久、运行模式较为成熟的出版发行机构。书局为了解决资金紧张的困难,在创办初期同时发行了“闽西列宁书局股票”。股票为“面额壹元”的彩色票面,正面上方印有马克思和列宁头像,两侧各配一把镰刀斧头和红旗图案,中间部分印有“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运动”。股票上还印有编号、收执人的姓名与地址以及书局主任的盖章等。这也是当时闽西苏区报刊印刷发行较为成熟的重要表现。同时以毛钟铭印刷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还有临时中央政府印刷厂、中革军委印刷厂、财政部印刷厂等,这些印刷厂共承印《红旗报》《战线报》《闽西红旗》《红色福建》《红色闽赣》等红色报刊17种,总发行量达20余万份。

针对报刊发行的“最后一公里”——邮局投递,中央苏区也作了统一明确的规定。早期“新闻报纸,重4两以内的贴邮票半分,重6两以内的贴邮票1分,重8两以内的贴邮票2分,重14两以内的贴邮票5分,重1斤的贴邮票6分,超过1斤,每重4两加贴邮票半分,如就地投递,则按其重量减半付邮”,报刊投递资费比普通邮件、书籍印刷物等便宜一半以上。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发出了一则《关于红报寄递条约继续履行六个月、红报通讯挂号和普通快费寄递问题》的通知,决定继续执行“红报寄递不贴邮票,照斤两给费的条约”的优惠政策。

为了更好地发行、投递报纸,中央苏区的各出版发行单位还在各地专门成立了推销代派处、代售处、公卖处;公开收费标准,明码标价;在报刊上公布推销费折扣规定;对代售处推行适当的奖励政策,比如中共闽粤赣特别为扩大机关报《红旗》的发行,规定“代售处负责推销《红旗》至十份者另赠《红旗》一份;三十份以上者(除十份赠一份外)加赠一份;五十份以上者加赠二份;一百份以上者加赠五份”。

叫卖队一般由当地群众担任,沿街推销书报,一律按比例折扣提取一定的劳务费。在1933年7月《青年实话》第2卷上用特大号字刊发陈丕显号召广大读者都来参加《青年实话》发行工作的文章。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中央苏区还有一批尽职尽责、不怕牺牲的邮递发行人员。1934年2月9日,赤水县邮局递信员赖近连路遇土匪,幸得县政治保卫队解救,但他却没有一点动摇,将失落的书信报刊邮件全部收集,转身跑回局内,继续投递。邮政局则在《赤邮通讯》上刊登号召大家都来学习他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

(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史海钩沉

## 福州涌泉寺鼓山系在马来西亚的衍

□赖文婷

我国与东南亚各国有着悠久的友好往来史,但该区域的佛教很早便由印度传入,汉传佛教只在后期对越南和马来西亚两个国家影响较大。其中,汉传佛教对马来西亚的影响主要是经由福建地区传入的。

随着马六甲王国统一马来半岛,伊斯兰教在该国广泛传播,佛教的影响淡化,给了汉传佛教传入该国的契机。18世纪,马来西亚种植业和矿业发达,福建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明末清初时形成了大规模的“下南洋”移民热潮。汉传佛教也随之传入。据开谛法师统计,1888—2005年间,马来西亚汉传佛寺的祖师有19座,其中18座都在福建省,位于福州的就有6座。

汉传佛教传入马来西亚,是随着福建僧人前往南洋募化开始的。汉传佛教的僧人长期驻锡该国弘法,则是从鼓山涌泉寺方丈妙莲法师入主广福宫开始的。槟城广福宫建立于1800年,由当地名商巨贾及侨民解囊乐助而成,“建祀观音佛祖”,故名观音亭。但官中也配祀着天后圣母、注生娘娘、金花夫人、大伯公、关帝等,香火十分鼎盛。与马六甲的青云亭一样,广福宫也是当地华人的一个组织机构,承担着“有事则纷纷推推,同南雀角之争”等仲裁侨民纠纷等职责。

妙莲法师是涌泉寺第126代住持,为曹洞宗第45世嗣法弟子,继任住持后,因寺宇蔽坏,于1885年前往南洋群岛募款建寺,1887年又因重修龟山崇熙寺,再次前往槟榔屿募化。再度前住时,妙莲法师在槟城声名远播。据《鹤山极乐寺志》记载,槟榔屿当地籍绅邱天德、胡泰兴、林花籍、周兴扬等雅重其器,“辞去广福宫旧住持焉”。1888年,妙莲法师与数位涌泉寺僧人同住广福宫住持。

虽然鼓山僧人得以在马来西亚自立、弘法,但广福宫毕竟不是纯粹的佛教寺院,侨民前来的目的往往也不是听经闻法。在其他神祇的生日时,侨民往往聚集广福宫,数日演戏狂欢。这些做法都与正统的佛教道场不合,妙莲法师深知其弊,决定在槟城建立一座纯粹的佛寺以传播佛法。1891年,妙莲法师在风景宜人的鹤山购地,开始兴建极乐寺。涌泉寺僧德如、本忠、善庆等纷纷前往相助。经过近十年的努力,马来西亚第一座正统的汉传佛教道场极乐寺落成,成为鼓山涌泉寺在该地的一座分院,妙莲为开山住持。这是马来西亚有汉传佛教道场的起始。

本忠1893年后随妙莲前往槟城创建极乐寺,1906年受妙莲举荐继任方丈。1935年本忠示寂后,极乐寺住持之位虚悬。1938年,涌泉寺住持圆瑛法师前往槟城募捐,受众人推举接任极乐寺的第三任住持。1939年抗日战争加剧,圆瑛法师募款完毕回到上海,寺务交由志昆法师以副住持的身份代理。此后,极乐寺第四任住持由圆瑛的弟子白圣接任;第五任住持由白圣的弟子台湾僧人达能接任;第六任住持则由槟城本地的日恒法师接任;第七任住持由出生东马的贤观法师接任。从前几任住持均为鼓山僧人,鼓山涌泉寺的法脉也在这里流传开来。

鹤山极乐寺创建后,前往马来西亚驻锡的鼓山僧人越来越多,并先后建立了一些其他的寺院。其中,与极乐寺及鼓山系僧人相关的有槟城玉佛堂与观音寺、古毛的观音阁。

玉佛堂和观音寺均由极乐寺第二任住持本忠所建,是极乐寺的分院。本忠在涌泉寺时便跟随妙莲修行净土法门,1913年开始在槟城大倡念佛法门,并在极乐寺万佛塔旁创建了念佛莲社。鹤山山举办法会时,信众多有不便,尤其是女众。于是,本忠于1914年将极乐寺位于车水路的寺产本源宫改建为玉佛堂,作为女众的静修之地。考虑到男女出入玉佛堂亦有所不便,本忠又将自己已在车水路的洋楼改为观音寺(又名莲花阁),供男众清修。因世局所迫,改建直至1922年春才开始,11月下旬竣工。

本忠为开山住持,协助建立道场者慧心、法空、宝龄等大多是鼓山寺僧。1935年,宝龄继任观音寺第二任住持。极乐寺宝龄及宝龄弟子广闻共同继任第三任住持,并于1963年重修该寺。莲社及两个净土道场的建立,使净土法门迅速传播开来。

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古毛的观音阁,由协助建立极乐寺的鼓山寺僧善庆创建,是该地的第一所佛教道场,始建于1904年。善庆为开山住持,但他并未住寺,观音阁的事务交由善辉、雪登、宝月、转凉、瑞真、瑞于、慈妙等打理。1948年,英国殖民政府将古毛民众迁往新村。村民将观音阁中的佛像、匾额、石碑等带到新村另建道场,名为新古毛观音阁,佛教色彩已淡化;原观音阁寺则由极乐寺住持兼理,较之前而言,民间信仰色彩减弱,渐渐趋向纯粹的佛教寺院。

作为下院,极乐寺及派下的寺院与鼓山涌泉寺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和联系,涌泉寺也会邀请驻锡槟城的僧人回山主持戒坛,或派僧人前往槟城代理寺务。涌泉寺前后入马来西亚弘化的僧人,有名讳可考的有20多人。有了前人的铺垫,其后鼓山系僧人的足迹逐渐扩大到马来西亚的其他地区,曹洞宗鼓山系不断在东南亚传播流行。

(作者单位:福建省宗教事务服务中心)

乡土史记

## 建瓯登云桥:文脉悠悠传千年

□颜郡 文/图

廊桥,闽北人也称之为厝桥、棚桥、亭桥。廊桥是在桥上盖了廊屋,形成一个能通行歇脚、遮风避雨的活动空间。闽北万山攒聚,溪流湍急,“往来之人苦于病涉,舟楫不可得而济,车马不可得而通,必资桥以渡焉”(宋黄元亮《乘舆桥记》),交通不便使得廊桥遍地生根。

据《八闽通志·地理志·桥梁篇》所载,建宁府(今属南平)的建安县、瓯宁县(今合并为建瓯)有桥165座,其中63座有“覆以亭”或“盖以屋”的描述,数量较为可观。

阳泽村地处建瓯市小桥镇,为建瓯南部古代第一重镇,是中原人闽经建宁府入古田至福州的重要通道,民国《建瓯县志》称阳泽为“建瓯第一良田美地”。在阳泽村的南才溪上,有一座造型轻盈的石拱古廊桥登云桥,在田野与翠绿山峦的衬托下显得异常古朴。登云桥架在4个桥墩的石拱之上,桥头两边各置一个楼台,两侧以半截栏杆围护,桥中央神龛供奉水神真武大帝,桥北端神龛塑关公像。

桥上廊屋青瓦盖顶,翘角飞檐,桥面铺设方砖,又以优质粗原杉木层叠为梁,桥长68.5米,宽5米多。进到廊屋,两侧挂板记录着小桥一带的历史名人、文化名胜、民风习俗。登云桥横卧溪面,一端连接公路,一端连接田畴,悠长的廊桥与山水田园和谐相映,锁水而成一个圆满聚落的入水境界。

登云桥经历代翻修重建。该桥本是一座简易搭建的木制便桥,被称为“矮桥”。南宋时期,卜居南龙池的郑氏家族家道日盛,因便桥窄小不便通行,于是拆去便桥建起了厝桥,更名

为“南乡桥”。袁枢进京赴考足经此桥,踌躇满志,借景抒怀,为故乡此桥题诗“玉龙倒挂寒潭,人在云霄天地间。借问是谁题柱去,茂陵词客到长安”,果然后来于宋孝宗隆兴年间登科及第,当地人取平步青云之意,改南乡桥为“登云桥”,延续至今。

步行走过登云桥,约数百米,一个村落跃然而出,这就是阳泽下辖的龙池村。此村人文荟萃,宋时有“状元村”的美名,又被称为“百官村”。当地流传着一个故事,秀才古进进京赶考途中行至登云桥,命村姑让行。村姑见秀才盛气凌人,便出了个“八刀分米粉”的对子,古进未能对出,没想到后来他竟用此对上了皇帝所出“千里重金钟”的对子而中状元。古进感念于此,遂备礼娶村姑为妻。传说村姑乃阳泽龙池人氏,此地求学之风蔚然,登云桥常有书生在此诵读,可见阳泽的人文底蕴深厚。

此地山灵水秀,墨客辈出,唐代“建州制科”开榜进士叶京、五代南唐辞赋大家江文蔚、南宋著名史学家袁枢、清光绪年间大书法家江孔殷等人都曾在此求学或讲学。郑氏家族还于南宋年间在当地创办了养蒙书院,以“惟忧子孙不贤,何忧产业不治”的族训勤学教子,族人出了包括宋端明殿学士兼签枢密院事忠穆太师郑珣、宋太常博士郑存、明朝刑部尚书太子少保郑赐、清朝刑部左侍郎郑重在内的194名官员,宋高祖亲笔诏赠谥予“忠穆阁楼,官林学家”匾额。

如今,登云桥不仅是涉河的交通设施,也成为人们休息、纳凉、交流以及举行各种乡间文娱、祭祀活动的场所。当地至今保持着农历八月初十郑氏祭祀仪式和岐山庵庙会等极具地方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也保存着一直延续下来的书院文化和祠堂文化。登云桥历经千年,在闽北廊桥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建瓯市小桥镇登云桥